



第二轴心时代文丛

The Second Axial Age Series

圣爱与欲爱

保罗·蒂利希的爱观

Agape and Eros

Paul Tillich's Christian Theological Idea of Love

王 涛 著

宗教文化出版社



王 涛 著

圣 爱 与 欲 爱

保罗·蒂利希的爱观

Agape and Eros

Paul Tillich's Christian Theological Idea of Love



宗教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圣爱与欲爱——保罗·蒂利希的爱观/王涛著 . -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9.4

ISBN 978 - 7 - 80254 - 118 - 4

I. 圣… II. 王… III. 蒂利希(1886 ~ 1965), P. - 神学:伦理学 - 研究 IV.B972
B82 - 0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40304 号

圣爱与欲爱——保罗·蒂利希的爱观

王 涛 著

出版发行：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100009)

电 话：64095215(发行部) 84037602(编辑部)

责任编辑：王志宏

版式设计：范晓博

印 数：1—1200

印 刷：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640×960 毫米 16 开本 16.75 印张 200 千字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80254 - 118 - 4

定 价：28.00 元

总序

当今世界的种种迹象让我们相信，我们正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与公元前八世纪到公元前二世纪的“轴心时代”相提并论，可誉之为“第二轴心时代”(the Second Axial Age)。

在雅思贝斯首先提出的“轴心时代”，世上出现了很多光耀千古的宗教界或哲学界伟人，例如在古希腊有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人，在巴勒斯坦有以利亚、以赛亚、耶利米等先知，在伊朗有祆教的开创者琐罗亚斯德，在中国则诞生了孔子、老子、庄子等诸子百家，在印度，佛陀释迦牟尼降生……他们几乎同时而相互隔绝地在世界各地涌现。借用雅思贝斯的话说：“这个时代产生了直至今天仍是我们思考范围的基本范畴，创立了人类仍赖以存活的世界宗教之源端。”这个时代的特征是人通过反思“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自我和自我的限度”。雅思贝斯把人类这些全面的改革称为“精神化”。

而我们这个时代，似乎也正在酝酿一系列巨大的变革。已有人把这个时代称为“全球时代”(马丁·阿尔布劳：《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和社会》)，也有人称之为以电脑技术为标志的“第五文明时期”(威廉·麦戈伊：《文明的五个纪元》)。这两个称呼恰如其分地点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相互关联的两大特征：一是人

类生活全面的全球化，二是高科技渗透和支配人的日常生活。前者很大程度是由发达的交通和通讯技术带来的结果，后者的普及把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联为一体，把人类社会生活融为一体。

但事情并不停留至此：我们这个时代还有一个甚至更加意味深长的特征，那就是雷蒙·潘尼卡所称的“多元论困境”，或者池田大作所说的“负面重力”。他们觉察到全球化生活给现代人的生存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张力或危机，生态危机、能源危机、核威慑，都是这种危机的表达。从消极方面说，这种危机使人处于极度危险的境地，很有可能招致全球毁灭；但从积极方面说，这却将迫使人们不得不跳出个体、国家、民族、种族的框框，尝试从一种全球意识出发，立足于全人类的利益考虑问题和采取行动。

由这三个特征，我们可以预想另一个轴心时代，另一个将全盘转变人类生活的时代，对它，“第二轴心时代”是一个恰当的名字。

综观第二轴心时代在人类意识领域的一系列“轴心式转变”，我们可以捕捉到这样一些新意识：全球意识、生态意识、女性意识、对话意识、跨文化意识、非实在论（或非本质主义、非基础主义）意识、亲证（生活）意识等等。这些意识事实上并非全都前所未有的、闻所未闻，相反，可以说它们大多在之前的人类历史中就已经以某种形式存在，只是处于压抑状态或边缘地位，但在今天特定的现实状况下，它们得以凸显出来并得到了发展。从深层次来看，第二轴心时代的种种新元素并非仅仅在今天才有。毋宁说，这些元素只是在今天获得了一个凯逻斯（*kairos*），一个特别合适的契机，它们的涌现既偶然又必然。

第二轴心时代的凯逻斯在客观条件上已经十分成熟，但其主

观条件,从目前来看却是大大滞后。旧生活的惯性极大,即便在重重迫在眉睫的压力之下,人类还是倾向于不管不顾地按照旧模式、老方式生活下去。

为了真正开启一个新时代,我们需要一场自觉的精神运动。属于第二轴心时代的一些新意识,如前面所提的全球意识、生态意识、女性意识、对话意识、跨文化意识、非实在论(或非本质主义、非基础主义)意识、亲证(生活)意识,今天在文学、宗教、哲学、社会学等各个知识领域都已有不少表达。近年来,宗教文化出版社与浙江大学的王志成教授的合作,已经出版了几部重要的宗教学著作,如“宗教间对话之父”、跨文化研究的倡导者雷蒙·潘尼卡的《宗教内对话》,非实在论宗教哲学家唐·库比特的《上帝之后》、《空与光明》;普世神学家保罗·尼特的《一个地球 多种宗教》,等等。

然而,我们越来越感到,我们的行动还需要一种更大的热情、一个更明确的主题。这时一个事件的发生启发了我们:2004年3月,世界一批学者在美国时代广场召开一次特殊的会议,名为“第二轴心时代犹太—基督教的未来”,为迎接第二轴心时代而对我们人类的生态要务、伦理要务、信仰形态、智慧形式等进行全面的讨论。在此背景下,浙江大学和宗教文化出版社决定合作推出一套丛书,并命之为“第二轴心时代文丛”!我们的目标是:希望以“第二轴心时代”一语引起人们对这个时代全面的重新审视和评估,唤起人们以一种新的、迎接的目光打量这个时代,并以一种合适的、相应的方式回应她的挑战,最终促成这个时代的诞生和成长。

第二轴心时代对我们而言仍是一个开放的、有待创造的时代,其具体形态如何依然是未知的。因此,此套丛书也是尽可能

开放，广泛容纳对这个时代的种种预想、揣测和回应。事实上，她本身既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又是这个时代的参与者和创造者。
愿她与时代共成长！
是为序。

王志成 陈红星

2006年6月于北京

序　　言

近年在香港，有关情色／色情的问题，尤其有关《淫亵及不雅物品管制条例》的争议，引起了社会的广泛讨论。不少人以为，基督宗教所讲的爱，主要是指人与上帝之间的爱，是属灵、神圣和牺牲的爱，是与身体或欲望无关而与性欲更是不可同日而语，是一种“圣爱”(agape)而不是“性爱”(在粤语中，“性爱”与“圣爱”在发音上是难以区分的)。有些人甚至可能会由某些基督教机构的致力于反色情或天主教教士的独身，进而以为基督宗教是卑视或否定性爱。问题是，这些是否就代表了基督宗教爱观的主流甚或全部？

对于当代社会文化的分析，不少都会涉及欲爱(eros)的概念，此一概念不单是佛洛伊德心理学中的重要概念，也是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的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 1898 – 1979)《爱欲与文明》(*Eros and Civilisation*)中的核心观念，用以分析及批判现代文明。那么，基督宗教所讲的圣爱，与现代文明中与爱欲有关的种种问题又有何关系？

有趣的是，一谈起基督宗教的爱观，很多学者都会想到虞格仁(Anders Nygren, 1890 – 1977)的经典名著《圣爱与欲爱：历代基督教爱观的研究》，并由此联想到，基督宗教所讲的爱就是一种超凡脱俗的圣爱，与柏拉图所讲的欲爱(eros)无关，与一般人讲的性爱更是对立的。然而，教宗本笃十六世(Benedict XVI)在登座

后发出之首道宗座通谕《天主是爱》，便是以爱作为主题，并且一再提及圣爱(agape)与欲爱(eros)的关系。那么，基督宗教究竟是怎样看爱？基督宗教所讲的圣爱，是否真的跟性爱或欲爱完全矛盾或毫无关系？

凡是稍为研究过蒂利希(Paul Tillich, 1886 – 1965, 另译田立克)的，大概都会知道一点他的罗曼史，甚至有人会因此而对他的神学具有一定的偏见。究竟这位至少表面上看来似乎对欲爱甚有丰富亲身体验的神学家，是怎样看爱、尤其圣爱与欲爱的关系？他的观点与虞格仁的又有何异同？蒂利希除曾任教于法兰克福大学外，更是阿多诺(Theodore W. Adorno, 1903 – 1969)的教授资格(Habilitation)论文的指导教授，蒂利希与法兰克福学派之间有着不少的关系。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蒂利希对圣爱与欲爱的观点，与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的欲爱观又有何关系或关联？

本书作者王涛博士在香港中文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专研现代神学家蒂利希的爱观。他的毕业论文一方面指出，蒂利希那种圣爱与欲爱的虽有分别却不分离的观点，是有别于虞格仁那种倾向于将二者截然二分的观点，另一方面王博士的论文也努力追溯蒂利希的观点在基督宗教的灵修、释经与神学的历史根源，并尝试说明此一观点的当代意义、尤其与马尔库塞的欲爱观的关联。如今，王博士将他的论文整理出版成书，相信除能扩展汉语学界对蒂利希的研究外，也能深化对基督宗教的爱观的认识，甚至有助教内外人士思考当代社会文化中的欲爱问题。这也是笔者的盼望。

赖品超
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
2009年1月5日

自序

本书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思想史中的蒂利希爱观——兼论与虞格仁爱观之比较》(*Paul Tillich's Idea of Love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Nygrenian Doctrine of Love*, 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6 年)的主体, 该论文中的一部分经由修改扩充, 在香港中文大学天主教研究中心以《圣爱与欲爱: 灵修传统中的天主教爱观》(*Agape and Eros: Catholic Love in the Tradition of Christian Spirituality*)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天主教研究中心, 2008 年)为题出版, 是本书的姊妹篇。

本书是我负笈香港期间学术思考的集中成果。香港是现代社会的典范, 初到之时, 我既被繁华的“石屎森林”、栉次鳞比的商号食肆所吸引, 更因为随处可见、林林总总的基督教教派堂会、教育机构而惊叹不已。这里既是世俗化、商业化的都会, 也是多元信仰兼收并蓄的天堂。虽然现代商业文明不可避免地为这片土地带来了浮华和浅薄, 却也令其经历了文明(自由民主法制)和信仰(宽容博爱)的双重洗礼。我在此地的生活异常强烈地感受到了蒂利希所说的“在边界上”(on the boundary)的处境, 这“在边界上”不但反映在文化境遇上、制度上、地域上, 更深切地发生在个体的存在深处, 令人唏嘘。

选择“爱”这个主题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对象, 自然是

“终极关切”的恩典使然。最初我选择“宗教多元论”作为博士研究计划，但却因为创新性问题困难重重，举步维艰。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崇基图书馆胡乱翻书时，无意间看到一本书页蜡黄、尘封已久的中译著作，名曰《历代基督教爱观的研究：爱佳泊与爱乐实》，著者是一位以前从未听闻过的瑞典神学家虞格仁。书是竖排本，术语也显得过时而怪异，很不容易阅读，但其目录却相当吸引人，是对基督教“爱”观念发展史的细致研究。于是在论文导师赖品超教授询问开题进展时，我向他表达了对基督教“爱”问题的兴趣，赖教授便推荐从蒂利希爱观入手，来进行同虞格仁的比较研究。从此，圣爱(agape)和欲爱(eros)这两个概念便成了我在港学术生活的关键词汇。蒂利希爱的四元特性：圣爱、欲爱、朋爱和力比多，也恰恰反映了我个体生存的处境与情态，而这四元的统合也正是我苦苦追寻的个体自我之实现和与上帝关系之和解。推而广之，信仰他律(无恩典的道德主义)或无信仰(平民阶层因信仰真空导致价值失落与沦丧，精英阶层则走向“愤青”式的悲观主义或庸俗的混世主义)，既需要给抽象的圣爱以一个具体的表达方式，让超越之爱落实在真实的相遇当中，而不至于堕入虚假的、空洞无物的标语口号，或“应许”的乌托邦远象当中；另一方面，欲爱式的实现也必须避免沦为纯粹的肉欲享受、颓废的沙龙清谈、权术博弈及权力膨胀，而应让与终极严肃性这一道义承当来转化之、升华之、成全之。

我开始研究蒂利希神学并最终有了这本初步的小小成果，完全得益于导师赖品超教授的悉心指导。作为香港学界仅有的几位蒂利希研究专家之一，赖教授以他精深的学术造诣和敏锐的洞察力，引领笔者步入蒂利希的精神世界，并向笔者言传身教：以严谨规范、深入浅出的方式治学，以谦卑精进的态度为人。本书的

出版应当首先感谢他。我还要向恩师尤西林教授致以最高的谢意，他是我基督教学术的启蒙导师，也是我治学为人的指向标。此外，还要感谢崇基神学院和文化与宗教研究系的诸位教授专家、尤其是温伟耀教授，感谢香港道风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的诸位学者，没有他们的帮助，本书便会失色许多。向浙江大学的王志成教授致以谢意，正是他的推荐，才使这本迟迟没有机会付梓的著作面世，同时，更要感谢本书责任编辑王志宏女士及宗教文化出版社相关编辑出版工作人员严谨高效的工作。

最后，感谢内子洁莲的关怀呵护，感谢我远在家乡的父亲母亲一直以来的鼓励和扶持，本书献给他们，算是最好的一份答谢礼。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十八日于香港中文大学许让成楼

引　　言

爱是人类思想史由来已久的主题。贯穿于思想史中的爱观念，主要在深受“两希思想”——希腊人文主义思想和希伯莱一神信仰(主要体现在基督教信仰中)影响之下的西方思想中得到了集中的关注。早在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哲学体系中，爱就已经成为了一个核心的范畴。围绕爱所展开的探讨和论争，也主要发生在基督教信仰领域当中。

爱是基督教伦理生活的准则，更是基督教信仰实践和神学真理宣称的核心，在基督教信、望、爱真理宣称的内在结构当中，爱是拱心石，“现在常存的有信、望、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林前 13:13)在基督教的信仰实践中，爱成为基督徒灵性修为(内在)和慈善活动(外在)的根本动力和内容，而在基督教神学的建构中，爱的观念及其理论也更是成为基督教思想的支撑。而爱作为基督教的信仰表白和伦理律令，其伦理要求便归为“爱的双重诫命”(double commandment of love)。福音书中耶稣回答经学家对哪一条诫命最重要的提问时，这样总结到：“第一重要的是：‘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主。你要全心、全性、全意、全力，爱主你的上帝。’其次是，‘要爱人如己。’再没有别的诫命比这两条更重要的了。”(可 12:29 – 31)在摩西五经(Pentateuch)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对爱的双重诫命的表达：“以色列啊，你要听，

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耶和华；你要全心、全性、全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申 6:4-5）“你不可心里恨你的兄弟；应坦诚责备你的邻舍，免得你因他担当罪过。不可报复、也不可向你的族人怀恨，却要爱你的邻舍好像爱自己。”（利 19:17-18）耶稣的伦理学，以及基督教神学都是建基于爱的双重诫命并围绕它们展开的。

对于爱观念的研究，尤其是对其精神结构及伦理学关切的探讨，成为当代人文学科（Humanities）的一个重要课题。特别是在人文主义（humanism）思想领域和基督教神学（Christian Theology）领域，围绕“爱”所展开的讨论更是方兴未艾。而以基督教神学的思想成果切入对于爱观的探讨，并由此对基督教所引介的爱观念同世俗人文思想中的爱观念之间冲突与融合进行分析与考察，为开掘西方思想的深层精神结构、提取其思想资源提供了重要的契机和可能性。

在基督教神学思想史中，对爱的讨论自古就没有间断过。而基督教对爱的理解和世俗思潮对爱的思考历来就保持着特殊的张力，时而对立分隔，时而融通共构，其间的复杂关系更是触及到个体存在的深层挣扎情态之上。当基督教思想界把自身对于爱的思考置于整个人类精神成果当中的时候，就迫切地需要确立自身的独特性，同时标明一个与自己实力对等的“爱”的理念作为对手。当代瑞典著名的路德宗神学家虞格仁（Anders Nygren, 1890-1977）便成为实现这一学术成就的集大成的思想家，他在自己的经典著作《圣爱和欲爱：历代基督教爱观的研究》（*Den kristna Kärlekstanken: Agape och Eros*, 1930）中便是如此分析出了两种爱的类型：体现基督教信仰独特性的基本主题圣爱，和柏拉图哲学

中体现希腊精神的欲爱。^① 前者是上帝中心的爱，是为他者奉献的、自我牺牲的、无动机条件的、上帝恩典俯就于人的爱；后者则是自我中心的爱，是自我实现的、利己主义的、为求索取的、自我拯救的灵魂上达至真善美之终极本体的爱。虞格仁认为，作为分属两个精神世界的精神气质或生活态度，圣爱和欲爱处于完全对立的关系当中，两者在本质上不存在相通之处，因此没有实现综合的可能。但虞格仁在处理基督教爱观念的演进时发现，在基督教爱观念的理论层面上，欲爱之爱不可避免地与圣爱之爱发生相遇，其结果是欲爱因素侵入到圣爱内涵当中，因而在他看来，整个基督教思想史便是一部在圣爱向欲爱妥协之下所形成的混合形态的爱观的历史。虞格仁的学术目的便是为了剔除基督教爱观中的希腊欲爱等其它古代价值因素，恢复一个基督教原创性的、纯粹的圣爱爱观念，以揭示基督教福音的根本理念和宗教驱力。作为对包括希腊人文主义和希伯莱传统在内所有古代价值的重估，圣爱之爱集中代表了基督教的核心价值，虞格仁将之运用到处理人与上帝、人与人之间的神学伦理关系当中，试图突出基督教圣爱作为爱上帝、爱邻舍的宗教及伦理要求的独特价值。但虞格仁在伦理生活中完全抹去了欲爱这一体现人实存本质的爱之因素的参与，圣爱和欲爱不可避免的相遇和相互作用并没有发生

① Agape 有多种译法，如“神爱”、“大爱”、“挚爱”、“诚爱”、“圣爱”等等。其中“神爱”倾向于“神”作为爱的发出者；“大爱”则表达模糊；“挚爱”容易同“友朋之爱”philia 混淆，且有泛称的色彩；“诚爱”则太过具有儒家本体论色彩，先人为主地引向耶儒对话，且缺乏基督教的位格特征；“圣爱”表达出了爱的神圣维度，同时又保留了在人文世界中承当与践行它的可能性，这种译法较为可取。Eros 的译法不多，通常译为“欲爱”，关涉人的精神欲求和包括感官需要在内的欲望，非常贴切。也有译法为“性爱”，强调 eros 与“性欲”的密切关联，但却遮蔽了其它灵性方面的涵义，具有相当程度的片面性。虞格仁著作的中译本《历代基督教爱观的研究：爱佳泊与爱乐实》对两概念的音译，不够醒目，不予以采纳。在运用“圣爱”、“欲爱”的译名同时，应当注意两概念内涵的原创性和多价性，如有特别情况，我们会单独加以注明。

在人具体的实存处境之下和人的存在当中,这使得他的神学—伦理学呈现出了一种分离圣爱—欲爱的偏颇。不过,他所提供的圣爱—欲爱这一张力范式,成为深入研究爱观问题的重要理论工具,为西方基督教神学学界在探讨爱观等相关问题时所广泛使用并在此基础之上展开深入讨论。即便是在当今罗马天主教官方,对于圣爱—欲爱问题都有所关注,新任教宗本笃十六世(Benedict XVI)登座后,即于2006年1月25日正式签名出版首道宗座通谕《天主是爱》(*Encyclical Letter: DEUS CARITAS EST of The Supreme Pontiff BENEDICT XVI to the Bishops, Priests and Deacons, Men and Women Religious and All the Lay Faithful on Christian Love*, 2006),不但将“爱”作为首道通谕的主题,并且还专门讨论了圣爱和欲爱及其关系的问题。^①

围绕圣爱和欲爱的关系,我们自然面临分离二者或是统合二者两种选择,虞格仁理所应当地成为主张分离二者的代表人物。^②而与虞格仁同处一个时代,亦同属路德宗的当代著名神学家蒂利希(Paul Tillich, 中译名亦为田立克, 1886 – 1965)则提出爱的力比多/欲爱/朋爱/圣爱“四元特性互动结构论”,此论不但突出圣爱对于欲爱统一体(力比多、欲爱、朋爱特性的联合)含混性的治愈和提升,更强调了欲爱令圣爱之爱具体化的诸种支撑作用,使圣爱和欲爱在人的实存当中彼此统合、相互作用。蒂利希

^① 参看:Pope Benedict XVI, *Encyclical Letter: DEUS CARITAS EST of The Supreme Pontiff BENEDICT XVI to the Bishops, Priests and Deacons, Men and Women Religious and All the Lay Faithful on Christian Love*, Jan. 25, 2006. 关于本笃十六世在该道通谕中对爱问题的具体讨论,请参看拙著《圣爱与欲爱:灵修传统中的天主教爱观》(香港,2008年)。

^② 统合指的是二者的综合统一,综合不是混合,更不是消溶为一,它是不失去或弱化双方各自的特性,而互相依存、不可分割,乃至互相界定、互相确证的关系。统合也指的不是在共同平台上的简单相遇和汇合,而是在共同根基之上的协作(synergic)关系。

尝试去解开虞格仁爱观的一个死结——过于强调圣爱的恩典力量,而忽略欲爱作为神-人力量,导致否定人的行动主体地位。蒂利希的爱观成为主张统合圣爱和欲爱观点的典型代表,与虞格仁的分离说鲜明对立。

遗憾的是,蒂利希统合圣爱-欲爱这一汇集西方思想精华的爱观,在学界并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尚未被赋予与虞格仁分离说对等的地位,从而成为与后者最具代表性的相对力量。在本书中,我们将介绍和分析蒂利希这种独特而丰富的爱观,并尝试将之置于思想史脉络当中,揭示并论证这种对于爱的深刻理解同其它诸多思想观念之间的关联。我们不愿把蒂利希统合圣爱-欲爱的爱观视其为一个个别的、孤立的观念,而是更想把它当作一个由来已久的传统,它纵贯思想史的演进过程,又横跨世俗人文思想领域和基督教信仰传统,并继续在当代思想脉络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蒂利希的爱观正是这个传统在当代思想中的具体体现,这就要求我们应当去考察蒂利希爱观在思想史中的根源,以揭示出这样一个统合圣爱-欲爱的传统。我们在本书中将主要考察蒂利希统合论爱观中对于欲爱的思考,这也是蒂利希爱观最具争议、最富有特色的部分,我们后面也将会看到,正是因为爱观中对欲爱的独特理解,蒂利希的神学也被称作“欲爱神学”(Erotic Theology)。而对于蒂利希爱观中圣爱-欲爱关系理解的思想史追溯,将主要集中在本书的姊妹著作《圣爱与欲爱:灵修传统中的天主教爱观》(香港,2008年)当中。

为此,本书将以虞格仁的爱观为论述起点与参照系,重点介绍和分析蒂利希统合圣爱-欲爱的独特爱观,我们将会回溯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世俗人文领域的非基督教爱观,以确立同虞格仁所主张的分离论相对立的蒂利希爱观中欲爱观念的历史渊源,